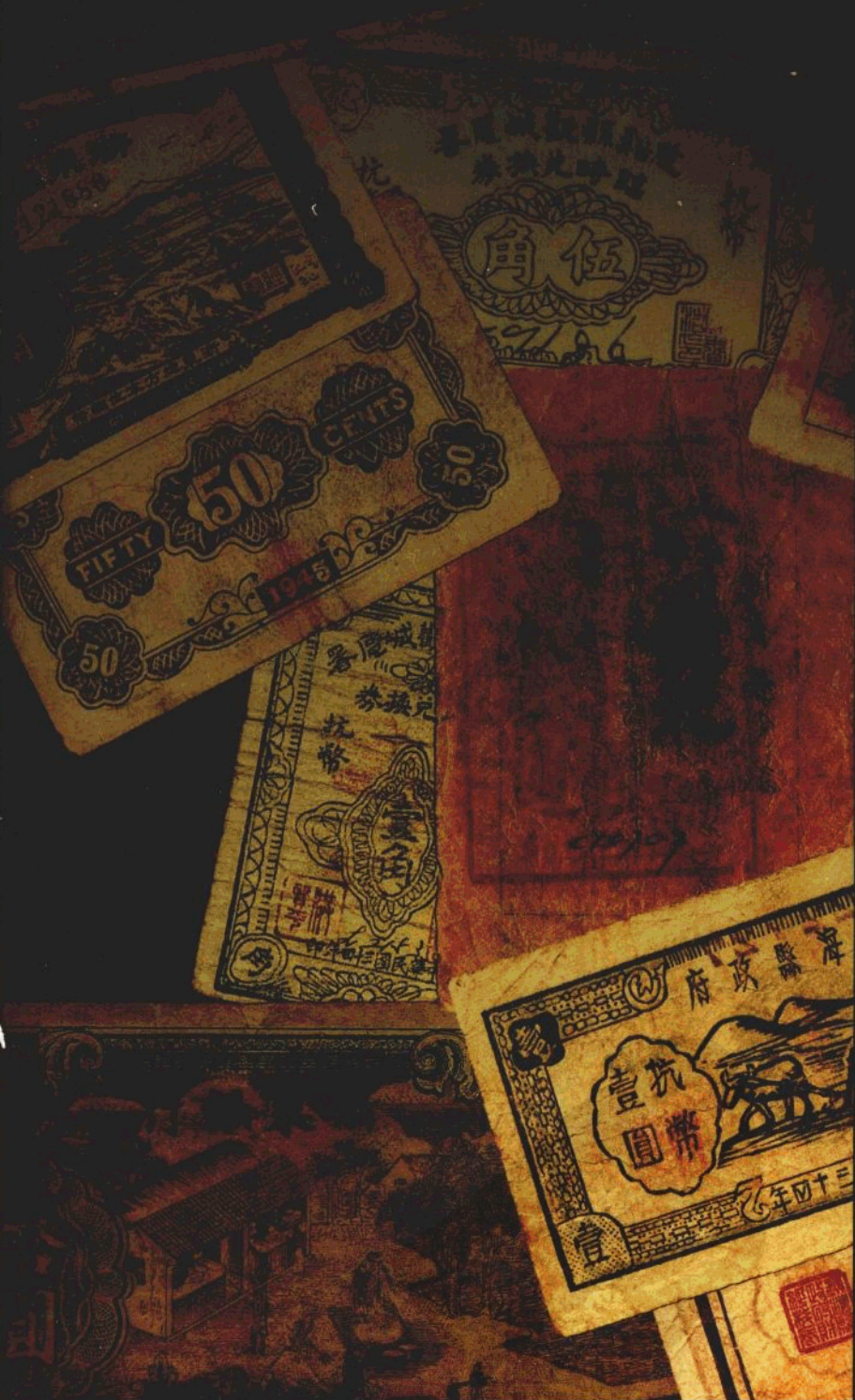


浙东革命根据地 货币史

章均立 主编

宁波出版社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编委会

顾问：黄建钧 唐廷文 龚建长

主任委员：徐尔元

副主任委员：史美泉 袁亦华 王骏琪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裕杏 王式高 叶重高 江成达

任国正 沈卫国 应勤 严亚芬

邹银聪 张伟达 陈春岳 陈霄

陈国峰 陈肥壤 郑晓敏 郑百良

周长桥 胡东奋 胡炜铭 胡剑稚

胡凤书 俞惠民 顾少军 楼松竹

虞中年 潘元福 潘国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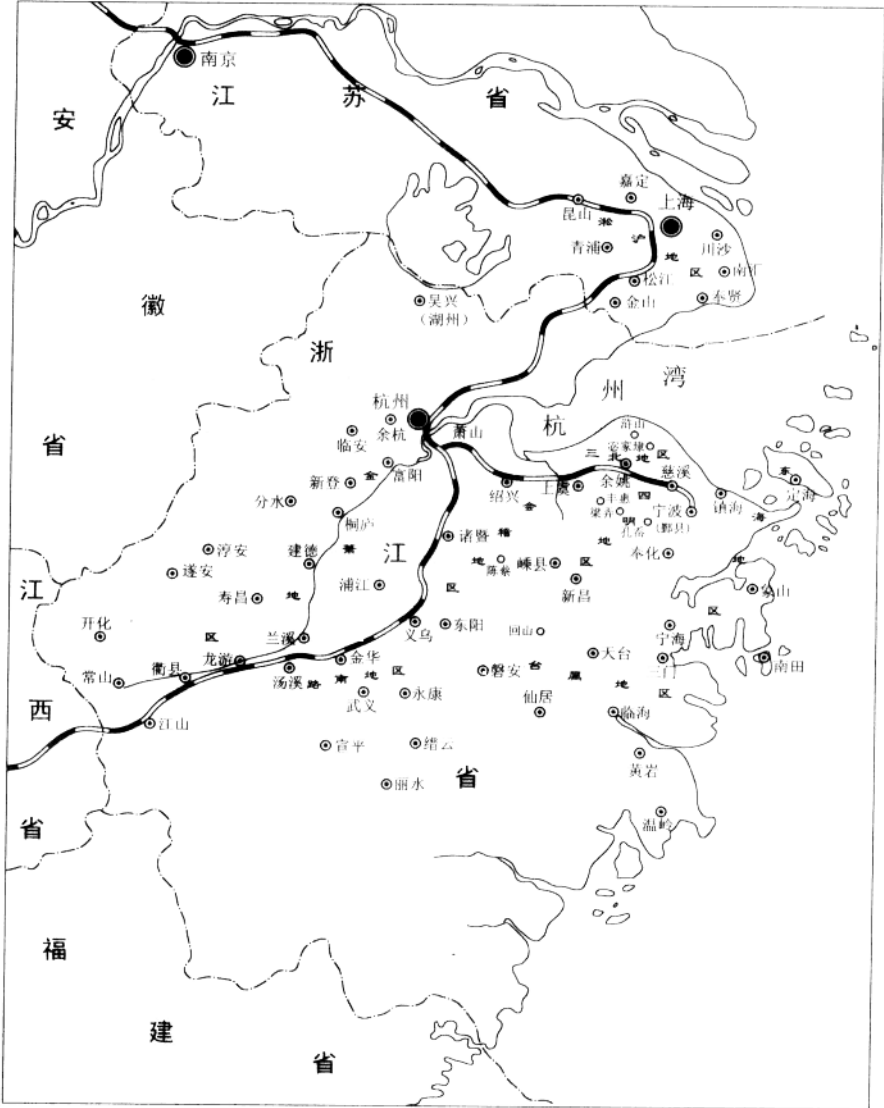
特约编委：陈浩 黄成 罗丰年 陈耀华

王清毅

主编：章均立

副主编：厉祖浩

浙东革命根据地示意图



序

在中共浙东区委员会成立 60 周年之际，《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市钱币学会献上的一份珍贵礼物，也是全市钱币爱好者经十年辛勤耕耘而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我有幸先看到书稿，谈两点感想。

首先，它填补了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研究的空白，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论述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的专著。浙东根据地货币从它产生到停止流通，尽管前后不到 10 年时间，然而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此，书稿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并归纳成三句话，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独立自主、统筹兼顾的原则，分散发行、分区流通的办法。书稿依据大量的实物和翔实的历史文献，对浙东根据地货币史的分期与根据地货币的种类、特征、发行背景、历史作用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这对抢救与保存这一部分革命史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借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书稿还揭示了浙东根据地货币的许多独特创造。如金库券的发行，至今其他根据地未见有此类券的实物遗存，也未发现有此类券发行的文献记载，因此它是浙东根据地的特有产物。如米本位的实行，战争时期的货币市场是十分混乱的，所见货币有实行金本位的，有实行银本位的，也有实行纸本位的。而浙东根据地货币实行的是米本位；在人民生活中，特别在战争环境下，米是最宝贵的物资，米价的高低变化，可以牵制或影响其他物价的波动，因此实行米本位，是有效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最佳办法。如全国惟一的金属抗币，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所发抗币均以纸币为主，惟浙东根据地的浒山区署发行了一套金属抗币；这是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是中国钱币宝库中的瑰宝。如多渠道、多层次、多规格的发行局面，正是这种局面，浙东根据地货币才得以形成独具一格的发行体系，呈现出琳琅满目的发行种类，才得以在根据地货币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据书稿统计，浙东根据地货币有 119 种 175 式之多，这在根据地货币史中是极为罕见的。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戴志强曾形容浙东根据地货币是“星光灿烂”，我认为这个比喻是十分确切的。这是浙东泉界引以骄傲的资本。

其次，它是一部形象生动的革命教科书，对于弘扬爱国主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书稿以浙东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实为背景，忠实记载了根据地货币产生、发展、消亡的战斗历程；突出反映根

根据地货币在支持革命战争，维护人民政权，繁荣根据地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着力讴歌根据地金融工作者不畏艰险，敢冒牺牲，为根据地货币的印制、发行、流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浙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货币工具，开展货币斗争的伟大实践；是浙东人民为着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复兴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我衷心祝愿《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不但能成为广大钱币爱好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工具，而且对帮助教育青年一代，启发金融工作者进行新时期的货币研究，发扬光大根据地时期的艰苦创业精神，促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衷心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星光能更加灿烂。希望有更多的爱好者、收藏者、研究者加入到钱币研究的行列中来，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货币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徐尔元
2002年6月
于杭州湾畔

编写说明

一、书稿的指导思想

本书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求实存真、如实地反映历史，坚持货币史与革命史的完美结合。以事实（包括实物与文选）为依据，以年代为框架，以浙东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实为背景，结合前人的回忆和后人的研究成果，采用点面兼顾，某些事例适当集中的叙述手法，力求竖不断档、横不缺线，全面、完整、准确、生动地勾勒出浙东革命根据地形成、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勾勒出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产生、发展、消亡的战斗历程，突出反映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在支持革命战争，维护人民政权，繁荣根据地经济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着力讴歌根据地金融工作者不畏艰险，敢冒牺牲，为根据地货币的印制、发行、流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使之成为总结历史经验，发扬革命精神，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教材，以促进货币理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强化和推进货币体系的变革，更好地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

二、书稿的时间跨度

自1941年4月浙东沦陷，至1949年9月浙东解放，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大时期。为叙述完整，个别事例，前提早到1941年2月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建立浙东敌后根据地伟大决策的提出，后延伸至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回收。

三、书稿的地域范围

仅限上述时间跨度内的原属浙东革命根据地的所有辖区。鉴于原根据地货币发行的实际情况和所见材料的不平衡，故以三北、四明地区为主。

四、书稿的材料来源

主要是实物遗存、历史文献、当事人的记录及回忆和后人的研究成果；以《浙东抗币》、《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和《解放声中的金库券》为编写基础。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实物和史料欠缺，而且不少当事人已先后谢世，因此挂一漏万，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五、书稿的结构安排

分四大块：

第一块为前言部分，包括序、编写说明、概述。

第二块为史实部分，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抗日战争时期，分部队办事处、三北游击司令部、浙东行委会、浙东行署四个阶段，用4章19节叙述。下编为解放战争时期，分北撤及迎接解放两个阶段，用2章4节叙述。

第三块为附录部分，内容包括大事记、简明种类表、粮票和饭票、研究资料索引、文献辑录等五个方面。另附后记一节。

第四块为图录部分，按金库兑换券、浙东银行币、地方政府币、民间商会币、金库券等五个条目排列。并根据罕见程度，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学术上的地位和传统的评价等，将货币分为五级，以四星为最高，依次为三星、二星、一星、无星。

全书约40万文字，其中图版190余幅。

概 述

浙东革命根据地开辟于抗日战争时期，壮大于解放战争时期。

在此期间，浙东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军、汉奸卖国贼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胜利，在经济建设中也取得很大成就。发行根据地货币，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在根据地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并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浙东的地理位置

浙江素有两浙之称，这两浙即为浙东与浙西。它以钱塘江、富春江、衢江为分界线，江之西为浙西地，江之东为浙东地。

地处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的浙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水道密布，山峦重叠，地形复杂，地势险要，适宜开展游击战争，又由于它是沿海南北交通的枢纽，故为历代兵家所必争。抗战期间，国民党视此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沪杭的东南屏障；日本军视此地为直通中国大陆、霸占江南、凯觎支那的桥头堡；共产党人则视此地为革命势力向南发展的战略基地和重要通道。所以，浙东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创建，就在沪杭甬之间的这块三角地带中，与敌、伪、顽展开了一场尖锐而激烈的搏斗。

为了对浙东的地理位置有一深刻印象，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划。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当政，复帝制，在浙江设立了钱塘、会稽、金华、瓯海4个道。会稽及金华的大部分为浙东地，会稽时辖鄞县、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南田、定海、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温岭等20个县，金华时辖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建德、淳安、桐庐、遂安、寿昌、分水等19个县。

民国十六年（1927年）取消道制，实行省县二级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增设行政督察区。后经多次调整，至浙东沦陷，上述地域内设立的行政督察区共有5个。它们是：第三区，辖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东阳、义乌、磐安；第四区，辖金华、兰溪、永康、宣平、汤溪、武义；第五区，辖衢县、开化、遂安、江山、常山、龙游；第六区，辖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定海、南田；第七区，辖临海、黄岩、仙居、温岭、三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为实行战时体制，便利整个浙东地区的管辖，又在天台设立起浙东行政公署。然而，国民党执行的是一条消极的抗战路线，政令无法畅通，行署形同虚设。

反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自南渡杭州湾后，依靠浙东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至1945年初，人民的新政权——浙东行政公署终于诞生，它由三北、四明、淞沪、会稽4个行政区组成。至解放战争时期，又扩大调整为由四明（包括三北）、路东（旧会稽地）、路西（旧金萧地）、路南（以永康为中心）、三东（舟山一带，包括镇海、象山一部分，后改东海）、台属（包括台东、台西）等6个行政区组成。活动范围北达上海黄浦江畔，南迄台州括苍山麓，西跨浙赣金萧线至钱塘、富春江两岸，东越舟山群岛至大洋海面。曾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8个战略基地之一，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

二、浙东的经济状况

浙东的重要性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因素外，还表现在经济上。除四明山、会稽山等少数山区外，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发展经济的条件很好，是历代统治者财政收入的一块宝地。

如晒盐业，这是沿海特有的产业，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杭州湾畔的庵东是两浙最大盐场的所在地。盐区横长纵狭形如扇，东西长80华里，南北宽10余华里，曾为全国三大盐场之一。其所产之盐，历来以色白、粒细、味鲜著称。大革命时期已有盐民10余万，有盐田10万亩，盐板60万块，年产量达200万担左右。

舟山渔业在全国也有着相当的名望，定海沈家门便是东南最为著名的渔业市场。据沦陷前调查，这一带以捕鱼为业的也有10余万人。

浙东的手制品，小小的金丝帽，竟扬名于世界。在余姚、黄岩、温岭，特别是三北长河一带，凡城乡女子，无论老少，每人手中均会捏上一把草，坐在家门口细心编织。“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便是此地此景逼真的描述。收入虽然低微，但是太普遍了，在一个地方统计起来，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据沦陷前统计，仅销到美国一地就有几百万顶。

浙东的最大产业还是棉和粮。

三北地区的百里平川，是浙江最大的产棉基地，亦是东南各省中最大的产棉区。其地由海沙冲积而成，最适宜种植棉花。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战争年代更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在上海及东南各省，浙东棉花特别畅销，有着特殊的行情。

浙东北部的宁绍平原，中部的新昌、嵊县、诸暨盆地，及西部的金华、衢州、东阳盆地，耕地集中，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水系完整，是浙江的主要产稻地区。由于农民的勤劳和耕作的精细，这里的耕地终年没有休息的时候，广阔的原野几乎四季保持着碧绿的颜色。收了稻子即种大豆，收了大豆又种麦子，一年三熟，而且收获量都很丰富。在那时，一亩中等的水田，普通的可收五百多斤稻子，上等的当在六七百斤左右。

此外，这里还有众多乡人，远涉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经商做生意。堪称商界领袖，在上海深孚盛名的虞洽卿，就是三北龙山人。浙东还出了一批金融世家，如镇海的方家、李家、叶家，慈溪的董家，宁波的秦家；涌现了一群金融行家，如叶澄衷、周晋龢、朱葆三、严信厚、宋汉章、叶琢堂、孙衡甫、秦润卿、俞佐庭、王伯元、李馥荪、李思浩、盛丕华等人。他们虽客居异乡，创业在外，但与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与当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然而，资源丰富、经济充裕的浙东，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人民负担沉重，生活困苦。沦陷后，许多在外经商的人失业回乡，有土地的则抽地加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当地奸商纷纷勾结国民党军政要员，大量囤米，大发国难财，市场粮食顿缺，引发米价飞涨。一般群众只好一升二升地买米，买一天，吃一天；缺钱又无货色的老百姓，只好以糠菜度日，有上顿，无下餐。此时苛捐杂税还特别的多，《新浙东报》1944年11月15日第72期中，就有“镇海江南某区人民负担，国民党统治下捐税多至40种”的报道。在国民党借筹募抗日经费名义大肆搜刮的同时，反动乡保长又层层从中盘剥，以致社会上竟流传这样的民谣：“乡长买田砌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脚底跑薄，老百姓抱头大哭。”三北地区则因棉花滞销，棉价暴跌，出现“一斤棉花一斤米，卖卖出眼泪，不卖饿肚皮”的惨景。

沦陷区人民更是蒙受了极大的灾难，除了政治上的遭迫害还有经济上的被榨取。对此，《新浙东报》有多次报道。如1944年4月20日第3期中，有“伪占观城仅5月，强增市税40种”的报道；1944年5月22日第11期中，有“姚鹏程压榨龙山镇，民众负担10万元”的报道；1944年10月30日第65期中，有“滕逆盘剥下的金山盐场”的报道。另外，还有“市面萧条，苦痛深重，梁弄民众不堪回首”、“内战未休痛难除，四明人民苛重负担”、“半年来内战结果，会稽山民不聊生”、“友军不断榨取，敌伪无尽勒索”等多篇报道，散见于《新浙东报》各期中。

在敌伪顽的多重盘剥下，浙东的经济被搞成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人民既恨日本鬼子的侵略和汉奸的卖国行径，也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官吏的贪污腐败。透过现实，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才是真正的抗日部队，同时，人们也从根据地的蓬勃生机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

三、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可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大时期，前期即浙东抗日根据地时期，后期即浙东游击根据地时期。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仅是浙东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的魔爪伸向浙东地区。鉴于浙东沦陷的形势，党中央和

毛泽东主席及时作出增辟浙东抗日战略基地的重大决策。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浙东人民很快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勇敢地投入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党领导的浦东抗日武装也迅速南渡杭州湾，挺进到浙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7月，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出领导干部到达浙东，汇合地方抗日武装，成立浙东区党委。先是在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的鸣鹤场一带站稳脚跟，开创了浙东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浙东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根据“坚持三北，开辟四明，争取控制会稽山”的斗争方针，挺进四明山区，于1943年4月攻克伪军重要据点梁弄，形成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革命根据地；又于1945年5月29日发起讨田战役，6月30日解放上虞县城丰惠，三北、四明、会稽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上述三年时间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根据地军民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高举团结抗日旗帜，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根据地在斗争中日益巩固和发展，成立民主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开展生产运动，发行抗日货币，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她巍然屹立在东海之滨，成为浙东坚不可摧的抗日堡垒，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9月30日起，为了国内和平，根据中央命令，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怀着对浙东地区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无比深情，忍痛北撤。同时留下少数人员，依靠群众，利用山地有利因素，坚持隐蔽斗争。

1946年6月，全国全面内战爆发，华中分局指示浙东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重建革命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发展浙东游击根据地。1947年1月，浙东工作委员会（后改组为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各地武装斗争全面展开。至1948年底，浙东武装控制了除县城、主要集镇及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各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农村包围城镇的态势。新四军北撤时留下的革命火种，在浙东大地发展成燎原之势。1949年，根据地武装与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挥戈东进，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浙东终于盼来解放，人民从此获得新生。

四、浙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发行

在创建红色根据地的斗争岁月里，浙东军民历尽艰辛，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同样，财政、税务、金融战线干部在组织财政收入，保证后勤供应，发行革命货币，与敌伪开展货币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为浙东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41年浙东沦陷，敌伪除了军事上、政治上进行镇压、奴役和控制外，在经济上则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为了排斥法币流通，搜刮浙东物资，榨取人民血汗，敌伪迅速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分

支行及办事处机构，大量发放伪储备票。由于敌伪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伪币迅速贬值，1943年8月间的伪储备票价格，宁波、诸暨跌至八五折，绍兴、余姚、萧山、上虞为七折左右，浙东某些地区则以对折计算。由于伪币充斥市场，使得设在边远地区和交通要道上的税卡不得不收受伪币。而伪币的一再贬值，不仅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也给根据地的税收、征粮工作带来许多问题。特别是金库划给军政单位的经费，由于长途解送，路上耽搁的时间较长，而军政单位收受的现金经费无法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开支掉，因此损失更大，有时甚至影响任务的完成。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的。它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又与革命的发展过程休戚与共。正是整个浙东地区革命力量的兴起、发展和壮大，决定了根据地货币的产生、健全和繁荣。根据掌握的材料分析，浙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就其发行渠道来说，可分为军政机关、专业银行和群众团体三条系列。就其发行种类来说，可分为金库兑换券（包括后期的金库券）、地方本位币和临时兑换券三大类别，据不完全统计，数量多达119种175式。就其发行过程来看，则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

1941年5月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至1945年1月浙东行政公署成立。该阶段，根据地刚刚形成，财经金融比较混乱，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处于初创摸索之中。该阶段的主要成就就是金库兑换券的创制。

（二）健全阶段

1945年1月浙东行政公署成立，至8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该阶段，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浙东银行创办，分行、支行、办事处在各地先后设立，财经金融管理开始走上正规的道路，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处于健全巩固之中。该阶段的主要成就是浙东银行币的发行和民间商会币的新生，金库兑换券则继续使用。

（三）发展阶段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至9月底接到北撤命令。该阶段，根据地迅速扩大，根据地内经济兴隆活跃，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处于发展繁荣之中。该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地方政府币和民间商会币的涌现。此时，货币的发行除银行部门外，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也相继参与。

（四）回收阶段

1945年9月底，浙东根据地党政军干部及武装人员奉命北撤，根据地货币停止流通。该阶段的主要成就是组织了抗币的回收。此举不仅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也维护了根据地货币的信誉。

（五）迎接解放阶段

1949年春，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浙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蓬勃发展的形势。在货币战线上，为尽快摆脱国民党货币贬值对解放区的影响，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根据地又迅速印制发行金库券。此举不仅稳定了地方金融和物价，还为人民币在浙东地区的迅速流通铺平了道路。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尽管发行总额不多，流通范围不广，使用时间也不长，然而，它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却是十分巨大的。它的发行和流通，不仅支撑了革命战争，维护了人民政权，繁荣了根据地经济，而且还培育了金融机构的干部，积累了财经建设的经验。它是浙东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浙东人民开展货币斗争，发展金融事业，掌握货币印制、发行、流通的一项伟大实践。

同时，在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浙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体现了统筹自给、独立自主的政策，采取了分散发行、分区流通的办法。由此而产生的独具一格、丰富多彩的货币体系和在打击伪币、占领金融市场、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使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得以在中国近现代货币史上，特别在人民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目 录

序	1
编写说明	1
概 述	1
上 编 抗日战争时期	1
第一章 部队办事处阶段(1941.4—1942.5)	1
第一节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
第二节 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开始	4
第二章 三北游击司令部阶段(1942.5—1944.1)	9
第一节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及三北游击司令部的组建	9
第二节 三北经委会的设置	9
第三节 此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	10
第四节 金库的筹建和金库兑换券的创制	12
第三章 浙东行委会阶段(1944.1—1945.1)	19
第一节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及浙东行委会的诞生	19
第二节 此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	20
第三节 金库兑换券的继续发放	23
第四章 浙东行署阶段(1945.1—1945.9)	24
第一节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及浙东行署的成立	24
第二节 抗币发行的筹备	25
第三节 浙东银行的成立和浙东银行币的发行	28
第四节 浙东银行币的发行种类	39
第五节 有关浙东银行与浙东银行币的几点说明	46
第六节 此时期的金库兑换券	65
第七节 地方政府币的涌现	69
第八节 民间商会币的新生	90
第九节 根据地货币发行的特征	106
第十节 根据地货币发行的历史作用	109

下 编 解放战争时期	114
第五章 北撤阶段(1945.9—1945.10)	114
第一节 奉命告别浙东	114
第二节 组织抗币收兑	116
第六章 迎接解放阶段(1945.10—1949.9)	120
第一节 建立武装,恢复根据地	120
第二节 发行金库券,迎接浙东解放	129
附 录	134
一、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大事记	134
二、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简明种类表	148
三、浙东革命根据地的粮票和饭票	158
四、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研究资料索引	185
五、文献辑录	191
后 记	203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图版目录	205
图 版	209
一、金库兑换券	209
二、浙东银行币	217
三、地方政府币	233
四、民间商会币	248
五、金库券	255

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章 部队办事处阶段 (1941.4—1942.5)

第一节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浙东沦陷

1941年4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浙东发起宁绍战役，很快占领了绍兴，并沿浙赣铁路西进夺取诸暨。接着于19日在镇海登陆，仅20日至23日四天时间，宁波、慈溪、奉化、余姚等地相继陷落。不到半月，日军就控制了杭甬铁路及其两侧地区。另一部日军则从海门登陆，占领黄岩，攻陷临海，形成钳制状态，沿海交通线全被封锁。10余万国民党军队虽进行了抵抗，但很快全线溃退，纷纷进入四明山、会稽山及以南地区。从此，浙东地区惨遭法西斯铁蹄蹂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早在1931年，浙东人民闻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就开始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

次年，即1932年的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又以飞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浙东各界民众迅速支援，并要求政府同日本“断然绝交，毅然宣战，拨调劲旅，增援驱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郊区宛平县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挑衅，公开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不辱使命，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浙东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

会即于10月成立。1938年5月，浙东临特撤销，改建为中共宁绍特委；1940年春，又将宁绍特委分设成宁属、绍属两个特委。宁属特委辖鄞县、慈溪县委和镇海、奉化、定海县工委；绍属特委辖余姚、嵊县、诸暨三个中心县委和上虞、新昌、绍兴县工委及萧山县委。浙东地方党组织成立后，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领导和推动各地成立政工队、救亡室、战时合作社及区、乡农会等进步组织，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响应劝募、踊跃参军，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1年4月浙东沦陷，处在浙东敌后地区的同胞生活即遭空前惨苦。一方面是日寇的直接威胁，一方面是和平军的强夺豪取，随之而来的还有不良军队的横征暴敛和土匪流氓的抢劫敲诈。在此国亡家破之际，中共浙东地方党组织挺身而出，发动群众，组建武装，积极开展抗击日伪、保家卫国的斗争。

在姚北，中共余姚县特派员张光指派副特派员王益生，至国民党三十四师残部孙彦龙连做工作，将孙部和庵东盐区缉私营共300余人，合编成立宁绍游击大队；未几，因缺乏斗争经验，王益生于6月25日在临山被害，孙部被策划投敌。不久，中共党员张中民化名张迪光，打入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秘密组织其中爱国抗日志士，准备建立抗日武装；后事泄，张中民等9人于7月18日在游源被宗德指挥部杀害；其中，张中民惨遭酷刑，手足被绑在强掰的毛竹上，分尸而死。11月，在中共党员朱之光、赵瞻、周曼天等的领导下，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在姚北建立，始有20余人，后增至90余人。在慈镇地区，中共宁属特派员王文祥派李平、沈邦祺等中共党员，组织敌后抗日武装，并指示郑洛民、包毅、楼天煜在慈北建立中共游击武装支部，打入慈溪国民兵团第五大队，以争取合法名义；后遭破坏，李平、沈邦祺、沈一飞等牺牲。6月，蒋子瑛、吕名鏊、梁涛等建立慈东游击队；9月遭日、顽夹击，损失惨重，部分人员被转移至镇海江南，并入中共领导的定海国民兵团独立中队；11月脱离国民兵团，与中共党员谢仁安领导的浙东青年突击队一起，转移至三北潘岙，改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五支队第四大队新四中队。

总之，浙东地区特别是三北一带（浙东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姚江以北地区），良好的政治组织基础，抗战初期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沦陷后中共地方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尝试，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浦东武装的南渡和三北根据地的开辟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战略部署作了重新安排。1941年2月1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陈毅并转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指示：

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